



品《茶经》：从功能到审美

□ 董晓波 袁梦瑶

茶，是文化、文明、精神的象征，《茶经》是世界上首部茶文化著作，在茶道思想、人文思想以及创作形式方面对后世影响深远。作者陆羽，唐代复州竟陵人，学识渊博、文采上佳，为人清高且淡泊名利。自21岁决定写《茶经》开始，就开始四处游历，对中华茶文化进行了考察学习。经过了前后26年的时间最终写完了《茶经》，因此，他也被后人尊称为“茶圣”。

《茶经》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第一部茶学与茶文化的经典著作，首次将茶叶的使用从功能层面上升到审美层面。它的问世，不仅代表了中华民族茶文化的精髓，其中蕴含的精神理念和价值思维更是中华民族实践、探索与创新精神的结晶，散发着哲理的光芒。

由“天人合一”之思想，见“茶人”品格

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在于“天人合一”思想，而“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又在“天人关系”上。陆羽在《茶经》中将道家的哲学观——自然天道观进行了淋漓尽致地阐释，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表现出了天人合一、崇敬自然的健康思想。世间万物都有各自的运行规律，遵从自然法则，顺乎自然之道，敬仰自然之态才是核心所在。如《茶经》第一章中记载，“其树如瓜芦，叶如梔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柝榈，蒂如丁香，根如胡桃”，从茶的色、香、味、形等方面用自然界常见之物来描绘茶叶，使得读者对茶叶的外形有了更加生动形象的体会。在自然之中找寻自然植物，以自然之物状态体会自然之物，感受自然的和谐与美好。又如《茶经》卷上，“茶之源”中写到：“野者上，园者次。”其说明野生的茶品质最好，人工种植的茶就比较差一些，更加崇尚茶的天然本质。《茶经》卷下，“茶之煮”关于煮茶用的水的论述时强调：“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煮茶多用的水应是远离喧嚣、清静甘冽的山水为最佳，人居较

少的江河之水为次之，人们日常饮用的井中之水为最下品。可见，《茶经》更倾向于纯天然未被丝毫污染过的自然之水，凸显了其自然天然。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以天为尊的习惯，但并不是惟天是从。在必要的境况下也会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有效地运用自然。在《茶经》中关于秉承自然的健康思想，从而达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例子比比皆是。《茶经》卷中，“茶之器”关于煮茶的用具的方面，对于24种器皿及其材质和功用进行了详尽的阐释，所用的材质充分表明了合理运用自然的健康思想。其多以木、竹、铁器为主，而木、竹本是自然植物，只需稍加制作，便可产生出精致的茶器。如“筥”由竹子编成，犹如藤编的箱子。“火铫”又称为箬，即火筷子，一般以铁和熟铜制成，以便夹火。“纸囊”是存放茶叶必不可少的工具，将烤好的茶放入其中，香气持久，不会消散。“则”乃是取物用的勺子，一种标准的量器。通常而言，一升水，配一勺茶叶，浓度刚好。若喜淡茶，用“则”少量取茶；若喜浓茶，用“则”多取一些茶即可。对于“则”的制作，多以海贝、蛎蛤等的贝壳或者以铁、铜、竹等为主，充分体现出对于自然有效运用的智慧。人乃万物之灵长，“茶”是草木中的“人”。只有崇尚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才能在采茶、制茶、饮茶的过程中达到最佳的美学享受。纵观整部《茶经》可知，在陆羽看来，茶已不仅仅是一种植物、一种饮品，他将俭朴的思想赋予其中，进而提出一种“茶人”概念，而君子的操守，便是茶人的品格。

由“精行俭德”之饮茶观，悟“茶德”思想

《一之源》篇云：“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这句话不仅成为中华茶文化以及茶德思想的开端，从深层次上还说明了饮茶由物质享用到精神熏陶的转化。“精行

俭德”是茶道的精髓，精行即行事精明，引申为采茶、煮茶、饮茶等过程要精益求精；俭德即德行俭朴，“俭”即节俭，这是儒家所倡导的美德之一。

《六之饮》通篇向我们传达的，便是“精行俭德”的饮茶观，这也是衡量茶人道德修养的基本标准。所谓“精”，即所有的工序都要精益求精。《管子·心术》中说“中不精者心不治”，也就是说一个人做事如果做不到专心致志，那么他做事的心力就没有到位。所谓“行”与“德”，是对茶人道德品质的要求，《茶经》认为，一个具有高尚道德操行的人，他在行茶事、品茶论道中也可以做得很好。这一点在陆羽的《六羡歌》中达到了完美的诠释：“不羨黄金鼎，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陆羽所倡导的茶学精髓即是“性俭”。他从饮茶的数量和茶汤的性质来说明“俭”的重要性。喝茶时，水不宜过多，从保健方面来讲，茶的药效也会因此有损减。同样，喝茶的碗数也不倡导过多，因为目的不是解渴，而是品味茶汤的精华。除此以外，趁热喝茶也很重要，茶汤的“沫、饽、花”，只有趁热喝才能品味得更加深刻，也是茶味最“烈”的时刻，若是等茶凉了再喝，则无法体味这种味感。所提倡的“俭”，在煮茶用具中也有体现，要求茶具要用生铁制成，瓷质和石制的茶具经不起长久使用。如果采用银制，又太过于奢侈，这里所体现的“俭”是节俭之意。俗话说“茶品即是人品”，茶与人是相互交融合一的关系，只有“精行俭德”之人，才能契合茶的俭德本性，才能在饮茶时把茶的“德性”升华到精神领域，以塑造出自身高洁的人格，更好地指导我们处事为人。

由“和”的茶道精神，感茶文化之精深

《茶经》通过对茶的自然特性与文化意蕴的契合思考，将茶文化由物质层面提升到“茶道”哲理层面。茶道是通过饮茶的方式，对我们进行礼仪

教育、道德教化，直至正心、养性、健身的一种手段。因此，可以说，茶道是中国茶文化的结晶，是生活、是艺术、是哲学。茶道精神是茶文化的灵魂，包含着人类终极价值的追问、生存本质的反思等，体现出博大深邃的茶学思想。

“和”的茶道精神，虽然没有明文出现在《茶经》之中，但历代爱茶习道之人都以此为茶道精神的一条共识，细究陆羽之意，“和”的思想确实蕴含在《茶经》之中。其大意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中和与和谐。茶事中的中和思想，主要体现在不偏不倚，把握分寸之上。制茶时，火要均，不能过急，反复反正，避免外熟内生。研磨茶饼时，要磨成颗粒状，“碧粉缥尘非末也”，研成片状或者粉末状都不适宜。煮茶的火候也要把握不偏不倚的尺度，水煮三沸，一沸之水有水膜杂质，三沸过后水又过老，所以煮水之时要注意观察水的沸腾情况，适时调味添茶。茶事之“和”还体现在对和谐的追求上。茶道，涵摄茶、人，以及茶事所涉及的所有器物环境。陆羽注重这诸种要素之间，即人与人、人与茶、人与器物、茶与环境器物等相互的圆融和谐。

纵观《茶经》全文可以探知，《茶经》系统介绍了茶的相关内容，包括茶的始源、煮茶过程、器具等。通过这些介绍，使茶在某些方面予以规范化，同时也借茶在道德、做人等方面促进人们和谐人格的养成，在品茶的过程中让人慢慢感受茶中蕴含的“精行俭德”，以及茶人所具有的君子品德，这既是出于社会安定的需要，更是出于对人自身修养的重视。饮茶不只是一种习惯行为，茶更多的是用来“品”，它代表着一种修身、修操守，进而以茶品人。

历史文化典籍

（此处为插图，内容为茶文化相关元素）

其依附于大奸臣秦桧，陷害岳飞。在呈坎罗氏家族祠堂，不见罗汝楫遗留下来的任何痕迹，呈坎罗氏也以罗汝楫为耻。其雕像与秦桧、万俟卨一起，乔跪在杭州西湖的岳庙，成为后世唾骂的对象。宗族对官员道德的评价影响深远，影响到家族和后世，使得官员不得不重视和认真对待。

倡导徽文化的规矩意识与创新精神。一方面，宋明理学给读书人从思想深处树立了规矩，科举制又将宋明理学作为考试主要内容，长期教化之下，徽州人规矩意识普遍较强。无论是徽州出来的官员、徽商，还是普通的老百姓，家中都有严格的家规、做生意的规矩。可以说，规矩意识已经贯穿到徽州人的潜意识中。另一方面，徽文化在学术上具有“求是”与“怀疑”精神，尚实笃实，敢于创新，领风气之先。以徽商为代表的“徽骆驼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徽州历史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含的政治智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传统政治文化典型范式。我们要立足徽文化资源禀赋，挖掘传统文化、政治文化、廉政文化资源，构建传统文化、政治文化、廉政文化和谐共生、融合共进良好态势，推动新时代良好政治生态建设。



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技能型人才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基础，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国务院也专门出台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大力推进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在全球职业教育领域，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颇具特色，也正是这一教育模式为其工业4.0奠定了夯实的人才基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双元制”教育模式将有利于拓展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思路。

“双元制”是一种由国家立法保障，将学校与企业、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紧密结合，以培养高水平专业技术人员为目标的职业教育制度。“双元制”中的一元是职业学校，另一元是企业或公共事业单位。接受“双元制”教育的学生必须和一家企业签订培训合同，在学期间，一周有1—2天时间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其余3—4天则在企业跟师傅学习生产流程，掌握解决生产难题的方法。

“双元制”教育的优势在于“多赢”：学生毕业后能够以娴熟的专业技能顺利实现就业；企业在劳动力短缺的局面下能够优先得到合格的雇员；劳动力市场得以良性循环，从而有利于保持企业活力和社会稳定。“双元制”教育模式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政府以多重手段发挥管理与服务职能。一是立法，德国有专门的《联邦职业教育法》，明确规范了学生、学校以及企业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如法律规定职业学校的学生要与培训企业签订培训合同，内容包括培训目标、培训时间、培训安排以及学生生活津贴等，各方都要严格依法履行合同。二是出资，在整个职业教育体系中，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欧盟以及企业、行业协会、工会、私立机构等共同分担教育经费。其中，职业学校方面的开支主要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来负担，学生在企业进行职业培训的费用和生活津贴则由企业承担。这其中政府出资比例约占30%，企业约负担70%。三是监管，如联邦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所的主要工作是为社会上300多种职业制定职业教育标准，以保证教育质量。四是协调，联邦、州委员会负责协调企业、学校及学生间的诉求与矛盾。

市场需求决定人才培养方向。企业是第一时间反映市场的晴雨表。根据国内外市场状况与发展趋势、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等，企业会确定自身的市场战略和人才需求，并相应地确定招收学徒的领域与数量。如近年在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领域，企业就加大了招收学徒的数量。可见，“双元制”教育的突出优势在于切中市场，保证社会所培养的人才恰恰是市场所需要的。这有效提升了教育的精准性，解决了教育与市场需求的供需矛盾，最终避免了社会资源浪费。

行业组织发挥组织管理作用。德国现有79个独立的工商业联合会，工商业联合会具有公共社团组织性质，其下设有行政管理部、法律法规部、税收部、国际部、职业教育部、工业创新部以及环境保护部等部门，职业教育部是其中最大的部门。根据法律规定，所有德国境内企业均须加入工商业联合会，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学生在与企业签订职业培训合同后必须先向当地的工商业联合会登记注册，再到职业院校报到，由此才正式进入“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中。工商业联合会负责在学校与企业、学生与企业、学校与学生间斡旋，其调解结果具有法律效力。同时，工商业联合会还为企业、学校与学生提供咨询支持。

社会对职业教育有着高度认同。一是社会不唯学历，很多德国人认为，掌握一门手艺十分重要。二是人力资源市场重技能，大学文凭并不是唯一的敲门砖，职业教育背景能获得与大学本科教育背景基本相当甚至更高的认可。三是技术人才受尊重，德国的技术工人，尤其是那些在职业教育体系中获得企业“师傅”资格的技术能手收入可观、工作稳定，社会地位不低。四是职业教育与大学普通教育双向互通。职业学校毕业生可以继续读大学，而大学生也可以接受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毕业生也拥有学士学位，他们的工资和大学毕业生几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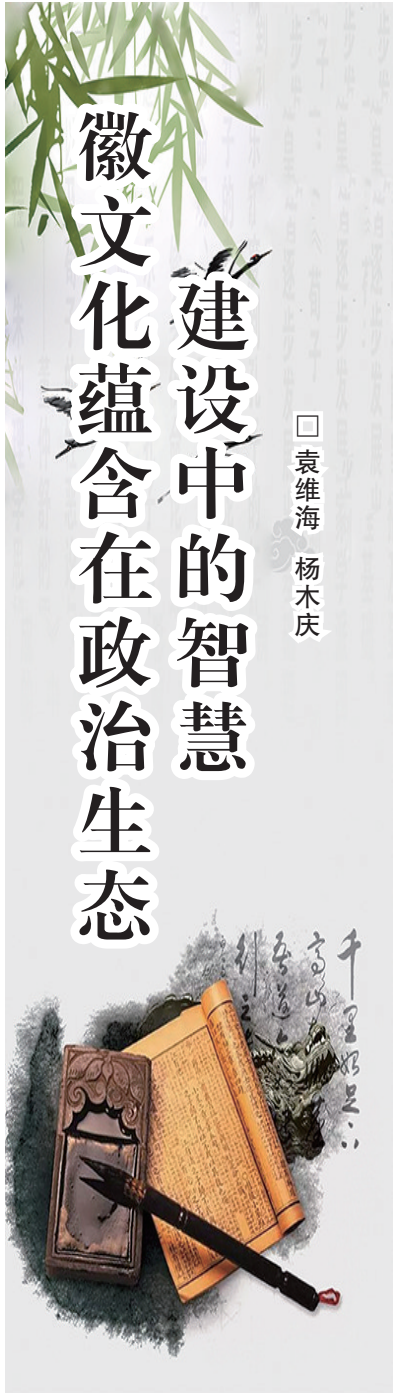
『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借鉴意义

□ 李 燕

没有区别，未来可以和大学生同样有机会向管理层发展。

为适应经济社会快速转型发展的需要，近年来我国加大了职业教育培养力度，以弥补技能型人才不足的缺口，德国的“双元制”教育模式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是人才培养的精准性强。德国企业会主动提出培养需求，从而保证了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精准对接。在我国，提升人才培养的精准性则要发挥好政府、职业院校和企业三方合力。政府要发挥前瞻性引导作用，引领职业院校按照全球产业发展大趋势、国家产业发展方向设置培养专业方向。职业院校则要紧贴市场需求确定培养方向，要敏锐捕捉到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家政、养老服务、托幼、电商、汽修等方面的人才缺口。还要让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过程，由企业提出岗位培养需求，以量身定制人才。二是教师有深厚的专业实践经验。德国职业院校教师都经过企业历练，并定期到企业去，企业中也有了一批高水平的“企业师傅”亲自带学生。“名师出高徒”，我国职业教育中也要注重定期让教师深入企业锻炼充电，选拔青年专业教师进行技能强化训练，还要从行业协会或企业聘请一定比例的兼职教授，并尝试让生产一线的能工巧匠到院校任教。三是职业精神和工匠精神深入人心。德国的技术工人普遍受到尊重，社会崇尚拥有一技之长的踏实的工匠。在我国职业教育中，要将弘扬工匠精神贯穿于教学、管理、实习等各个环节。员工录用和人才选拔要以工匠精神作为重要依据。要营造强大的社会舆论氛围，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工匠精神。



徽文化蕴含在政治生态建设中的智慧

□ 袁维海 杨木庆

徽文化是中国古代徽州一府六县区域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是当今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典型样本，由此衍生的徽学则成为中国三大地方显学之一。徽文化中的政治文化、廉政文化，内容丰富、内涵精深，在挖掘徽文化价值过程中，我们应科学汲取徽文化中的价值精髓，充分运用徽州历史文化智慧，促进新时代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在徽州政治文化、廉政文化的长期影响和熏陶下，明清徽州地区涌现了一大批名臣廉吏。据有关统计，清代共有状元112名，其中徽州本籍及寄籍徽州子弟考中状元的有19名。徽州府科举入仕人数更是处于全国各府之翘楚。如，清代歙县本籍或寄籍京官者，有大学士4人、尚书7人、侍郎21人、都察院都御史7人、内閣学士15人，地方官更是不计其数。《婺源县志》也明确记载了婺源县明代县官以上有505人，清代县官以上326人。徽州官员不仅入仕人数多，而且都具有共同的政治品质：一是廉洁自律、洁身守道，现有文献很少有徽州贪官污吏的记载；二是刚正不阿，多谏官能吏；三是具有独立的人格，不依附于权臣；四是不畏邪恶，敢于抗争；五是勤政爱民，造福一方；六是兴才育学，热衷于地方文教事业。徽文化熏陶了徽州人从政为民之道，同时也促进了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较高历史智慧价值和现实意义。

培育和践行儒家传统从政价值观。“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徽文化崇德修身，注重礼义名节的价值理念，构成了徽州士族的从政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影响下，徽州士族养成了独特的价值标准和价值体系：不以当官发财致富为职业动力，而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责任担当。政治风气一旦形成，便代代相

传，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约束体系与道德体系，固化为徽州官员道德内化的力量源泉。

建构徽州士族“蒙学—大学”的教育体系。徽州士族“养正于蒙”，成于大学。徽文化尚文重教，文化教育发达。徽州士族在为官之前，必须受到严格而系统的文化教育，其内容以国学为主，诸如诗书礼仪、经史子集等，既有私学、官学等正规教育，又有家族、师生、父子传承等非正规教育，体系完善而系统。徽州士族于蒙学、小学时期形成的价值观，历经大学教育中的“穷理”后，其从政的价值观与信念更为成熟和坚定。

实行宗族治理乡村社会模式。徽州人特别重视家族、宗族，徽州官员生活在宗法社会，其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受宗族和家族影响较大。徽州人通过族规、村约、家法、楹联等形式，为族中子弟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文化氛围。由于良好的族风、家风，家族亲人间相互影响、相互监督，徽州出现了“父子宰相”“叔侄同朝”“四世一品”“一门三进士”的家族廉政文化气氛。家族内为官先辈及其他邑内先辈的榜样及标杆作用，也使得徽州官员有着更大的自我约束力及更高的行为规范标准，这是一个区域廉政文化形成与传承的良性循环过程。宗族内部的关键性人物、宗族整体力量、宗族文化，都是徽州政治生态文化形成的重要社会基础。为教育后世，徽州大族族内官风清廉的子弟死后，以文字形式记述其为官清廉历史，彰显后世。

推崇徽州先贤的榜样力量。徽州的名家大儒热衷于教育，以徽州独有的教育体系培养出了徽州士族。徽州历代先贤名臣也为徽州士族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与标杆，成为他们宦宦生涯的约束力。与此同时，对贪官污吏的惩处也有其独特一面。罗汝楫是徽州历史上有详实记载的、少见的佞臣，